

元明清小說選

李格非

吳志達

選注



元明清小说选

李榕非 吴志达 选注

责任编辑 许树棣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河南新乡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125印张 238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400册

统一书号 10219·43 定价：1.1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录元明清三代影响较大的作家三十人（无名氏除外），文言短篇小说五十七篇。作家的身世及著述均有简明的介绍，每篇作品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手法均有扼要的评述，生冷词语和所涉及的典章制度均有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前 言	(1)
宋 本 (一篇)	(18)
工 狱	(18)
杨 瑀 (一篇)	(24)
聂以道	(24)
陶宗仪 (一篇)	(26)
贤妻致贵	(26)
宋 濂 (一篇)	(29)
秦士录	(29)
高 启 (二篇)	(34)
书博鸡者事	(34)
南官生传	(38)
瞿 佑 (三篇)	(43)
爱卿传	(43)
翠翠传	(51)
绿衣人传	(62)
李 祯 (三篇)	(68)
琼奴传	(68)
芙蓉屏记	(76)
秋千会记	(82)

赵 弼 (一篇)	(89)
续东窗事犯传	(89)
马中锡 (一篇)	(107)
中山狼传	(107)
蔡 羽 (一篇)	(123)
辽阳海神传	(123)
邵景詹 (二篇)	(135)
姚公子传	(135)
贞烈墓记	(142)
宋懋澄 (二篇)	(147)
负情依传	(147)
珍珠衫记	(158)
詹詹外史 (一篇)	(164)
刘奇	(164)
无名氏 (一篇)	(168)
周廷章	(168)
无名氏 (一篇)	(176)
唐寅	(176)
无名氏 (一篇)	(181)
小青传	(181)
徐 芳 (一篇)	(194)
雷州盗	(194)
王猷定 (一篇)	(197)
汤琵琶传	(197)
李 渔 (一篇)	(202)

秦淮健儿传	(202)
侯方域 (二篇)	(211)
马伶传	(211)
李姬传	(215)
魏 禧 (一篇)	(218)
大铁椎传	(218)
汪 琬 (一篇)	(222)
江天一传	(222)
邵长蘅 (一篇)	(227)
阎典史传	(227)
吴雷发 (一篇)	(235)
浙中宦者	(235)
钮 琇 (一篇)	(238)
咪娘	(238)
王士禛 (一篇)	(251)
某中丞	(251)
蒲松龄 (八篇)	(255)
劳山道士	(256)
婴宁	(260)
连城	(273)
促织	(280)
梦狼	(290)
司文郎	(295)
席方平	(305)
胭脂	(313)

袁 枚 (二篇)	(326)
书麻城狱	(326)
三姑娘	(331)
纪晓岚 (八篇)	(335)
老学究	(336)
塾师密札	(337)
李生	(338)
药帖	(342)
富商	(343)
柳青与益寿	(345)
云南令	(346)
借檐避雨	(348)
沈起凤 (一篇)	(350)
村姬毒舌	(350)
和邦额 (一篇)	(353)
谭九	(353)
浩歌子 (二篇)	(359)
青眉	(359)
秦吉了	(371)
俞 樾 (一篇)	(378)
秦娘	(378)

前 言

—

由说书艺术发展起来的话本小说，是我国古白话小说的瑰宝，而志怪传奇以及某些野史别传等文言小说，也应是祖国艺苑中的奇葩。文言小说源远流长。唐人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发展的丰碑，宋以后它虽渐趋衰落，然而艺海拾珠，尚有珍奇；夕阳虽近黄昏，晚晴亦多异采。

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杂剧和散曲，传奇小说只有清江宋梅洞的《娇红记》是唐人嫡派。有些散文家的人物传记，可作文言小说来读，为数也不甚多。吴曾祺编《旧小说》，曾有所辑录，但从小说艺术的尺度来衡量，尚不足快人心意。明清时代，白话小说成了文学主流，但文言小说也并非绝响。明初洪武年间，瞿佑模拟唐人传奇，作《剪灯新话》，风靡一时，仿效的人很多；李祯《剪灯余话》、邵景詹《觅灯因话》可算是其中的代表。尽管作者多是封建文人，但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传奇小说，言情志怪，与他们所提倡的道学，大相径庭，因而遭到禁止，一度沉寂冷落。到了嘉靖年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学唐人小说的风气又复兴起来。诚如鲁迅所说：“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

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中国小说史略》）

及至清初康熙年间，蒲松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创作《聊斋志异》，把文言小说推向了新的高峰，以其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技巧，受到人们的激赏。鲁迅把它与明末的志怪传奇作了比较，指出它的成就说：“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鹖突，知复非人。”（同前）时人起而应和效法者众，涌现出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写出许多传奇新作，有些篇章可以媲美唐人。较知名的，如袁枚《新齐谐》、沈起凤《谐铎》、和邦额《夜谭随录》、浩歌子《萤窗异草》、管世灏《影谈》、冯起凤《昔柳摭谈》，其他种类尚多，备见《清代笔记丛刊》。

纪昀不满意《聊斋志异》的写作手法，他评论说：“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主张尚质黜华，追踪晋宋文风，因撰《阅微草堂笔记》以抗《聊斋志异》。效法《阅微草堂笔记》而又有所变化者，亦不乏其人。

明中叶以迄清代乾隆、嘉庆之际，文言小说颇有复兴气象。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肯定某一时代的某种文学体裁，便否定或轻视其他时代的同类文学体裁。这一时期某一作家的传奇小说集或笔记故事集，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外，一般来说，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者固然不多，但是如能选集各家精萃，暮

云合璧，亦可蔚为奇观。我们正是本着这种想法选编此书的。

二

自先秦汉魏以迄六朝，旧小说从萌芽状态到形成雏型，作者非有意作小说，它的概念亦与今人所称“小说”的含义迥异。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所谓“小说家”，记述的是“街谈巷议”，“道听涂说”，“刍蕘狂夫之议”，属于“残丛小语”之类，大都缺乏完整的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六朝志怪、笔记，多半记述轶事琐闻或神鬼变异之谈，作者当作记录事实，并非有意从事艺术创造。倒是某些史传文学，尤其是野史杂传，却有一些作品，颇具今人所理解的小说意趣。唐人传奇汲取史传文学与六朝小说的艺术经验，并在当时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促使小说发展日臻成熟，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运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塑造出各种各样的艺术典型。在单篇传奇作品中，最富于艺术魅力的，是《太平广记》编纂者列为“杂传记类”的小说；其他一些深受读者赞赏的名篇，也带有人物传记的性质，不过具有更多想象夸饰的成份。这也是“传奇体”小说的精萃。回顾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认识元明清文言小说的价值及体制上的某些特征。

衡量一个时期某种文学样式成就的高低，首先要看它有无时代特色，是否反映了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尤其是特定时代的特殊矛盾和新鲜事物；其次，看它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程

度以及对待矛盾的态度，这里当然包含着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是非善恶观念和道德情操的看法问题。作为文学艺术，更要看它的美学价值如何，与前代相比，在艺术上是否有所发展或创新，在美的发展历程中，提供了什么新的、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觉得，元明清文言小说，就其所能承担的任务和可能作出的贡献而言，比较好地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我们批判地继承这份文学遗产，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疑是有益的。

在我国社会发展史上，元明清已是封建社会的末期。这一历史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显著的特征。一般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是在明中叶嘉靖、隆庆以后出现的。而就手工业、商业的发达，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来说，元代就已经相当可观了。曾在大都侨居了二十年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于1295年回国后，对大都的盛况作了生动的描述。当时大都的工匠，约有四、五万户，而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内的工匠，是在官吏的监督下劳动的，带有工奴的性质。我们从宋本写的《工狱》中，可见其劳动组织和生活状况。另外，还有许多“穷汉”靠出卖劳动力糊口，属于雇佣关系。杭州出现拥有四五架织机、雇工十余人的丝织业手工作坊，其雇佣工人“衣食于主人”并领取工资。实际上，这就是在封建社会母体中孕育着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因素，到了明代，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废除工奴制，降低商税率，就很快地得以滋长起来。明中叶，商品货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商业资本非常活跃。在商人中尤以徽商居多，他们往来各地，牟取厚利。蔡羽《辽

阳海神传》、宋懋澄《珍珠衫》，正是这种社会现象的写照。

清初虽曾限制和打击工商业，但生产力是最革命的要素，势必是束缚不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封建主义的重压下，仍然茁壮地成长起来。明中叶就已经出现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劳资关系，到了清代康、雍、乾时期，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航海事业、对外贸易，空前繁荣。一部分地主兼工商业者，成了暴发户。而延绵二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则已濒临于衰亡阶段；尽管清统治集团还处于鼎盛时期，但作为古老的封建制度，却已日薄西山，奄奄一息。从甄西逸《过墟志感》、钮琇《觚觚》续编《海天行》等传奇小说中，可从不同的侧面窥见明末清初的时代特点。新兴市民阶层的壮大，形成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从而使社会矛盾复杂化。除了农民与地主这一对传统的矛盾以外，新兴市民阶层与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也日趋尖锐。高启《书博鸡者事》所描写的元至正年间江西袁州市民反抗封建豪强的斗争，张溥《五人墓碑记》所描写的明天启七年苏州市民的抗暴斗争，都是早期的市民运动。而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朽，也比唐、宋以前为尤甚。这突出地表现在吏治的腐败和人材的被埋没等社会问题上，也表现在封建邪恶势力对善良人民婚姻家庭的破坏上。前者如《工狱》、《席方平》、《书麻城狱》和《秦士录》、《南宮生传》、《大铁椎传》所揭示的那样，冤狱遍于国中，才智之士无所用；后者如《爱卿传》、《翠翠传》、《琼奴传》、《贞烈墓记》、《睐娘》所描写的悲剧。

这一时期在思想意识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个性解放

和平等自由为核心的初步民主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哲学思想即程朱理学的矛盾斗争，相当尖锐，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现象。这在对待封建权威、爱情婚姻等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程朱理学以“三纲五常”为“天理”，主张“存天理，去人慾”。而以孔子为崇拜的偶像，君主为封建国家的绝对权威。进步思想家，从元代的邓枚、明代的李贽，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等人，则与理学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邓枚、黄宗羲都对封建专制主义作了猛烈的抨击，矛头直指封建君主；李贽则批判了对孔子偶像的崇拜、反对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以“情”抗“理”，讽刺了假道学。

反映在传奇小说上，《续东窗事犯传》中，胡迪赋诗斥责天曹地府，批判天道神明，公然与阎君当面辩论，这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君王的亵渎。《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对皇帝喜好促织游戏，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作了尖锐的批判：“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贩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与黄宗羲在《原君》中指责封建君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一人之淫乐”，是为“天下之大害”，可谓异曲同工。在描写爱情婚姻的传奇小说中，出现不少以“至情”感人的作品，“至情”可以突破阴阳生死的界限，无视身份地位的贵贱，不顾门第家世的高低，如《绿衣人传》、《琼奴传》、《唐寅》、《连城》、《秦吉了》等，就是讴歌“至情”胜“理”的好作品。至于象《老学究》、《塾师密札》等篇，对假道学的讽刺，也是极其辛辣的。

三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崇高的精神文明的东方古国，有许多传统的优秀品德，高尚的情操。我们应当历史地、具体地分析问题，把封建社会末期统治阶级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而宣扬的伦理观念，与广大人民在生活实践中所遵循的传统道德，区别开来。例如“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及忠于爱情、坚贞不渝，勤奋好学、谦虚谨慎和拾金不昧等等美德，我们都需要发扬光大。《聂以道》、《贤妻致贵》，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小故事，却表现了两个妇女的优秀品质。那个要儿子把拾得的银子送还失主的母亲，那个为使丈夫挣脱牢笼而甘心忍受痛苦的妻子，灵魂是多么的美好！《琼奴传》中的琼奴，《芙蓉屏记》中的王氏，《贞烈墓记》中的郭雉真，《秦娘》中的秦娘，她们身处逆境，在邪恶势力的逼迫下，敢于斗争，为了忠贞于爱情，宁死不屈的品德，也有其深刻的教育意义。有的人污泥而不染，坚贞守正，维护人格的尊严，选定意中人，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跳出了火坑，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女性的觉醒。

气节情操是一种精神力量，不只在爱情、婚姻、友谊及日常生活中起着积极作用，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中，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江天一传》、《陶闾史传》中所歌颂的民族英雄的气节，读之感人至深。这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

气，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将永远激励着炎黄子孙，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与一切外来的强暴势力斗争到底。

任何事情，都会有成功，有失败。在胜利或挫折中，采取什么态度，也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道德修养。《秦淮健儿传》和《马伶传》，从健儿和马伶这两个不同的典型中，我们可以受到有益的启示。健儿自恃膂力过人，狂妄自大，以为“世人皆不足敌！”结果却被一少年所降服。马伶在失败中刻苦自励，深入生活，深刻地体察人物思想感情、言行举止，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表演艺术，终于取得了成功。这说明骄傲自满是招致失败的祸根，发愤努力、刻苦学习才是成功之路。

四

在这个选本中，力求主题、题材方面的多样化。我们想通过这一时期文言小说中有关爱情、婚姻题材作品的复杂现象，探讨、思考一些问题。这个带有传统性的、甚至是永恒的主题与题材，由于时代的特点和作家对生活的不同认识，各自呈现出丰姿异采。与唐人传奇比较，与同时代的戏曲、话本相比，这一时期文言小说的艺术趣味、审美观念都很不相同。在唐人传奇中，爱情与婚姻的悲剧，往往与士族婚姻制度、科举功名，有着密切的关系，《霍小玉传》、《莺莺传》乃至志怪性的《任氏传》等，女主角的悲剧命运，都与家世有关。元明清的爱情剧，如象《西厢记》、《拜月亭》、

《墙头马上》、《牡丹亭》、《长生殿》等，都是在悲剧性的矛盾冲突中，引出喜剧性的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已经揭示出来的矛盾。话本可能迎合市民的趣味，在爱情描写中色情渲染较多。这一时代的文言小说则不然，我们从《爱卿传》、《翠翠传》、《琼奴传》、《负情侬传》、《周廷章》、《小青传》、《贞烈墓记》、《睐娘》等篇中，可以看到真正的悲剧，真、善、美的典型是如何在假、丑、恶势力的破坏下遭到毁灭的。这大体上有三种情况：

一是由于邪恶力量暂时的强大和正义者的弱小，在矛盾冲突中正义者被扼杀。如罗爱爱、刘翠翠、琼奴、郭雉真等的悲剧都是如此。在元末兵荒马乱的年头，武夫弄权，人民遭殃，在强暴、邪恶势力的逼迫下，孤立无援的罗爱爱以死来保全自己的贞操，这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控诉，也正是悲剧的深刻意义。刘翠翠与金定自幼同学，青梅竹马，情深义重，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美满婚姻。但是刘翠翠却为人所夺，金定与她咫尺天涯，无复相见，先后抑郁含恨而死。琼奴、郭雉真的悲剧，则是在明代地方豪强与黑暗吏治相结合的情况下必然的产物。暴发户、军官，为了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凭借金钱权势，诬陷善良人民，制造了象琼奴与苕郎、郭雉真一家的悲剧。

二是在金钱作用下产生的悲剧。一部分士人、富商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见异思迁，或背叛、出卖爱情，或破坏别人的家庭与婚姻。如《负情侬传》中杜十娘的悲剧、《周廷章》中王娇鸾的悲剧；《珍珠衫》中楚中贾人的家庭悲剧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李生既慑于封建家长的权威，又贪婪盐

商的高价收买，权衡利弊得失，屈服于市俗的金钱和潜在的封建势力，而抛弃了患难相依的杜十娘。王娇鸾的悲剧则完全是由于周廷章的贪图财货、喜新厌旧的卑劣品性所造成的。楚中贾人的家庭悲剧，既源于“商人重利轻别离”的生活方式，也由于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传统的封建贞节观念，在一部分市井妇女中，失去了约束力量。

三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祸害。《小青传》中小青的悲剧，在于一夫多妻制的封建时代，侍妾的卑贱地位。她颖慧多才，风流文静，却嫁给一个庸俗的豪公子作妾，主妇悍妒，软禁空闺，如处墓穴，竟在凄风苦雨中郁郁死去。她应该享有正常的爱情生活，可是冷酷的现实却把她的一切都剥夺了。《睐娘》中睐娘的悲剧，则在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一个心灵纯洁、富有才艺的好女子，却为其姑母所欺，被逼与一个她所鄙视的狂徒结婚，备受屈辱，抑郁沉痾，含恨自缢而死。这确是真、善、美被假、丑、恶所毁灭的典型。

五

元明清时代的文言小说，继承了唐人传奇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而表现在现实主义上，对揭露矛盾的广泛性与深刻性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表现在浪漫主义上，对理想的追求更加强烈，更富于幻想性。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不仅是揭示现实生活中矛盾的深度的问题，还有真实性和典型性的问题。前面所论及的对爱情、婚姻、家庭悲